

印度與毛共關係之演變

沈鈞傳

印度最近採取了一系列的「睦鄰政策」，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四月十五日印度外長查萬(Y. B. Chavan)在下議院宣佈，政府任命資深外交官納拉揚南(K. R. Narayanan)為駐毛共大使，預定兩個月內前往北平就任。毛共副外長韓念龍隨即向印度代辦梅羅特拉(L. L. Mehrotra)表示同意印度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的建議。

一九六二年匪印邊界衝突發生以前，印度就召回其駐北平大使，不久毛共亦召回其駐印大使，以為報復。十五年來，雙方關係幾乎全面凍結，既無雙邊貿易，亦無正式交往，外交關係只維持在代辦級這一階層之上。毛共認為雙方關係正常化，應由印度採取主動；印度則堅持毛共應首先派使前來新德里，然後印度才採取相應的措施。在過去十五年中，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和歷任外長都曾再三公開表示，希望與毛共恢復正常關係，毛共也曾以各種姿態明示類似的願望，但是由於某種外來的因素，以及雙方都不願採取主動，致使這一外交突破到最近才告達成。

一九六二年邊界衝突以後，不僅沒有解決雙方的邊界糾紛，反而增加了彼此的猜忌。毛共深怕印度利用流亡在印的達賴喇嘛，在其他大國的支持下，成立流亡政府，以增加毛共統治西藏的困擾。在外交上，由於美蘇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爭相援助印度，引起巴基斯坦的不安，因此毛共於一九六三年，和巴基斯坦締結了一項臨時協定，暫行劃定中國新疆與巴國所屬克什米爾的疆界，毛共以此為餌，積極拉攏巴國，用以制衡美俄在印度的影響力。但是毛共與巴基斯坦的邊界協定却激起了新德里的強烈抗議。認為這一協定抹殺了印度對全部克什米爾的主權，因此也更使新德里懷疑，毛共與巴基斯坦正

在結成一個軍事同盟，用以對抗印度。

一九六五年印巴克什米爾戰爭爆發前，毛共與巴國獲致某種諒解，一旦印巴戰起而印度攻擊東巴時，毛共將出兵協防，可是這次戰爭印度並未對東巴出兵，使得毛共師出無名，未能直接而積極地援助巴基斯坦。毛共利用巴基斯坦打擊印度的策略雖遭挫折，但是毛共並未因此而放棄這種策略，而且更進一步支持巴基斯坦，達到打擊印度，制衡美俄在次大陸的作用。

毛共一方面加緊和巴基斯坦勾結，加強經濟與軍事援助，希望以外的力量來助長印度內部的政治分裂，進而削弱印度的實力；另一方面慫恿印度東北部鄰近印緬邊界的納加(Naga)和米佐(Mizo)族人從事叛亂活動，予以武器裝備支援，並在雲南省境內為之代訓游擊幹部，一九六八年六月，印度強烈地抗議毛共公然訓練納加和米佐族人在印度從事叛亂活動。毛共對於印度的抗議並沒有否認，而是指責印度在「蘇修和美帝」支援下，陰謀包圍中國大陸。此外毛共還支持印度西孟加拉省境內的毛派納薩萊特(Naxalites)份子從事武裝暴動，採取鄉村包圍城市的戰術，建立革命基地。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納薩萊特中的一支，在毛共全力支持下，於加爾各答成立第三個印度共產黨——印度馬列主義——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可是這股暴力運動，在印度邊防部隊的全力圍剿下，如曇花一現，瞬即消除，到了一九七一年印巴戰爭後，東巴獨立為孟加拉國，納薩萊特運動的主力已全部消失。

印度在一九六七年後期曾一再向毛共表示，願意重開談判，希望恢復正常關係，但是毛共始終未加理會，其原因可能是：(一)毛共認為印度是美、俄圍堵中國大陸的重要角色。(二)印共馬列主義在西孟加拉的「革命情勢一片大好」。(三)一九六七年毛共文革正值高潮，外交活動停頓。(四)一九六

八年十月，中華民國一位要員前往新德里出席甘地逝世百年紀念，毛共惡毒地指責印度企圖製造兩個中國。

總之，一直到毛共於一九六九年春召開九大，宣佈結束「文革」以前，毛共和印度的關係，始終處於僵持的狀態之下。

一

一九六九年毛共九大到一九七一年底孟加拉危機期間，由於蘇俄在一九六九年決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之後，新德里放出可能和北平恢復友好關係的空氣，甘地夫人也再三表示，友好關係之門隨時暢開着。可是北平的態度一直把印度視為反動派，美帝和蘇修在亞洲包圍中國大陸的工具。一九六九年九月，因為毛共繼續對印度採取各種敵對行動，引起印度議員的反感，其中有一二五名議員曾發表一紙聲明，要求印度政府與毛共斷絕外交關係。此後，儘管毛共對印關係的實質並未改變，但是在形式上則顯出許多轉變的跡象，所以雙方關係自一九七〇年開始已逐漸由緊張而趨於緩和。其原因除了對印度過去兩年來，再三表示願意重修舊好的一種直接反應外，毛共經歷文革挫折後，在外交上開始改弦更張，恢復以往和各國的正常關係，而對印度外交上的試探，也是其笑臉攻勢的一環。

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勞動節的招待會上，毛澤東突然和印度駐北平代辦握手言歡，並說出兩個鄰邦必須友好相處的話來，同時毛共的傳播工具也停止對印度作出敵對的抨擊。十月十二日，毛共駐開羅大使，拜會印度大使，晤談七十五分鐘，事後印度雖稱之謂「禮貌上的拜訪」，實際上却代表着自一九六一年以來，雙方官員的首次正式接觸。據印度有關方面透露，在那次開羅拜會之前，毛共在東歐和非洲的大使，曾同樣地拜訪過當地的印度使節。一九七一年九月初，印度決定接受毛共之邀，派遣乒乓球隊前往北平，參加十一月舉行的亞非乒乓球友誼賽，此一行動係印度乒乓球總會取得政府同意後所作之決定，也是印度對毛共笑臉外交的一種反應。東巴危機發生後，印度總理甘地夫人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初致函周恩來，願就巴基斯坦陸軍在東巴的殘暴行為及大量東巴難民湧入印境的問題從事協商。印度總理這種致函曾引起各方注目。

從前述各種官方與非官方的行動來看，毛共與印度都改善雙方關係的潛

在原因。毛共希望印度擺脫蘇俄的影響減少對西藏難民的支持，尤其這一階段中，毛俄關係惡化烏蘇里江珍寶島發生軍事衝突，中亞邊境也劍拔弩張，尤其是蘇俄官方地圖中，修改中蘇邊界衝突地區的邊界線，完全偏袒印度，由此可見，中蘇共都在爭取印度，結果毛共顯然因為先天條件的不足而屈居下風。於是毛共加緊聯絡巴基斯坦，以期制衡印俄在次大陸的勢力。可是在一九六九年，決定以新式武器援助巴國，使印度引以為忌，因此新德里對北平作出各種試探，此無非在警告蘇俄，對巴國的軍事援助應適可而止，印度對毛共的外交姿態果然有效，在一九七〇年，蘇俄終於停止向巴基斯坦提供和出售武器，其目的顯然在阻撓印度與毛共關係的進一步改善。

三

由於東巴問題的區域性發展，使得新德里和北平的關係再度轉趨緊張。東巴醞釀自治運動之發生，顯然受到印度的幕後支持。一九七一年八月印蘇簽訂為期廿年的友好、合作、和平條約，一方面鼓勵了印度直接介入孟加拉獨立戰爭；另一方面在阻止毛共對巴基斯坦的可能干涉，進而打擊毛共在第三世界的威望。北平深知這一條約的真正目的，但是為了避免刺激印度，最初對這一條約採取比較審慎的態度，所以並沒有加以指責，甚至於周恩來在十月的報告中，也不提毛印關係，可是到了一九七一年底印巴戰爭爆發，毛共便揚棄了這種審慎的態度，開始抨擊印俄條約，認為它是一種侵略性的聯盟條約，聲稱如果沒有這一條約，印度決不致於以武力支解巴基斯坦。

孟加拉獨立後，使次大陸的均勢發生根本的變化，所以毛共必須考慮印巴孟三國關係的調和，以及蘇俄對印度日增的影響力。首先考慮的當然是繼續向巴基斯坦提供軍經援助，穩定布托政權，使巴國在次大陸仍然具有制衡印蘇的作用。其次希望巴基斯坦接受孟加拉獨立的現實，進而達成三國和平共處的關係。再者為了和孟加拉接觸以減少印蘇對這一新國的影響力，乃不顧巴基斯坦的要求而同意孟加拉進入聯合國。最後，毛共當然希望改善與印度的關係。其實印度自從與蘇俄簽訂條約以後，儘管一再強調這一條約並非軍事同盟，印度無意放棄不結盟政策，但是許多國家則不同情印度的立場，所以印度想藉着和毛共及美國的關係，來沖淡其對蘇俄的依賴，澄清不結盟

國家對印度的誤解，因此毛共與印度在一九七一年以後，有幾件事實可以看出，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努力，並不因印巴戰爭和孟加拉的獨立而從此終止。例如：(一)印度拆除自一九六二年以來，設在新德里毛共使館門前的警衛和瞭望監視台。(二)印度外交秘書卡爾(T. N. Kaul)出席十月一日新德里毛共使館舉行的僑國慶招待會。(三)印度如期組隊參加十一月在北平舉行的亞非兵乓友誼比賽。(四)毛共廣播印度慶祝毛共偽慶的祝賀電文。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印度外長辛格(Swaran Singh)在向國會的演說中強調，印蘇條約不是反對任何第三國為目標的，如果任何國家願意，印度也願考慮作類似之安排。此外辛格還向毛共建議，要求藉直接談判，解決雙方關係的問題。一九七二年十月，毛共在聯合國行政及預算委員會中，譴責印度干涉西藏問題。而印度則立即明白地承認毛共對西藏的主權，表示並未庇護西藏流亡政府，更不會以任何方式支援西藏的叛亂活動。

一九七三年三月，毛共派遣馬牧民為駐新德里代辦，以取代一等秘書代理館務，這表示了毛共對印改採較為積極的態度，但是雙方關係全面改善，似乎還需等待，因此印度也只好派出與馬匪職位相同的梅羅特拉為新任駐北平代辦，以取代二度連任米希拉(B. C. Mishra)。從此以後，雙方的新關係並沒有任何突破，相反的毛共對於印度和尼泊爾、錫金關係的加強，却引起了很大的反感，並不時地攻擊印度，以便促成希瑪拉雅山各小國對印度保持適當的警覺。

四

據一九七三年印度外交部年報中指出，這一年中，雙方有許多跡象朝向關係正常化，例如在二至三月間，納土拉(Nathu La)雙方邊境附近的喊話站已停止對罵。四月依索比亞航空公司開闢之取道印度飛往中國大陸的航線，印度允許毛共旅客在孟買過境，可獲廿四小時的自由行動，免除任何簽證的限制。但是達賴喇嘛訪問歐洲，印度雖然表示這是達賴的個人行為，不含任何政治因素，可是毛共認為，印度給予簽證就是擴大反對毛共的行為，使雙方關係又蒙上了陰影。

一九七四年五月八日，印度完成第一次地下核子試爆，「新華社」僅作短短兩行文字的報導，而毛共官方各報也未作評論，僅以譯文轉載西方攻擊

印度試爆的觀點。一直到六月五日鄧匪小平對日本親善訪問團的談話才說出來：「蘇俄是印度核子試爆的幕後策動者……在南亞製造混亂與分裂」。六月十七日毛共從事第十六次核試，這可以說是以行動來反擊印度的核試。六月十三日，毛共副總理葉匪劍英在接見印度柯隸斯醫生紀念委員會(Dr. Kohli Memorial Committee)秘書長拉地飛(Daniel Latifi)時表示，兩國人民的友誼有悠久的歷史，今後這種傳統友誼必定會更加鞏固和發展。印度外長辛格八月初訪問韓國途經香港時稱，只要雙方同意，立即可以將目前的關係升高到大使級這一階層，為了討好毛共，他還強調，印度不參加任何對某一國家的防衛計劃。談到蘇俄所創議的「亞洲安全體系」，辛格表示，蘇俄並未向印度提出這一構想，即使提出，印度也無意參加。而毛共則多次表示，印度首先必須與巴基斯坦達成關係正常化。以此作為毛共與印度正常化的先決條件。

一九七四年印度雖然作出許多友好的表示，可是在錫金問題上遭到毛共的攻擊，尤其印度正式答應親印國大黨的要求，宣佈允許錫金成為印度的一邦，觸怒了毛共，所以到了一九七五年，毛共加強對緬甸和孟加拉的壓力，再度訓練印度的分離分子，在緬印邊境從事游擊活動，同時還暗中協助孟加拉國內的左派極端主義者。不過事隔不久，雙方又開始頻頻接觸，作出各種友好的試探。元月廿四日，印度代辦梅羅特拉在北平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毛共副外長韓匪念龍以及有關負責的負責幹部也應邀出席，一時氣氛非常良好。元月廿七日，毛共兵乓球隊在「體育文化部」副部長趙匪正洪的率領下，前往加爾各答參加第卅三屆世界兵乓錦標賽，隨隊參加者除十八名男女選手外，還包括龐大的記者、電視攝影隊以及外交人員。印度駐匪代表還兼程趕回新德里。毛共的體育代表團除了比賽以外，一向負有政治任務，因此當加爾各答比賽結束後，毛共兵乓球隊還訪問了新德里，更增加了濃厚的政治色彩。毛共代表團領隊趙匪正洪，更是非常活躍，在拜會之餘屢次表示希望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的言論，兵乓賽結束後，趙還在體育館門前種植了一顆小白花小樹，並且表示：「希望這棵小樹能象徵兩國之友誼」，同時他還暗示願意拜會甘地夫人，可是甘地夫人那次僅僅接見贏得女子單打冠軍的北韓選手朴英順，使得受人注目的毛共兵乓外交，僅祇達成了中共與印度民間的友好氣氛，並未發生政治上的作用。

到了二月間，毛共偽副總理陳錫聯率團參加尼泊爾國王的加冕典禮，在往返途中都在加爾各答過境，他在答覆記者問話時再三宣稱，毛共有意和印度關係正常化，並表示隨時願意和印度舉行正常化之談判。陳錫聯這次在印境兩度停留之所以受到重視，主要是因為這是一九六二年來第一架毛共飛機在印境降落，而且這架專機載有足夠的燃料可以直接往來於加德滿都和昆明之間，不必在印境添加燃料，因此其意義之不尋常也就可想而知了。

經過多年來的試探，以及毛共與印度內部的變化，再加上國際間各種客觀情勢的已趨成熟，終於促成了四月十五日雙方同意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當然印度自甘地夫人宣佈緊急狀態，實行獨裁統治後，國內局勢已趨穩定，

義大利政局及其大選

陳澤豐

正當西方各國共黨紛紛宣布脫離俄共而獨立自主，國際共黨陣營呈現四分五裂之際，南歐的義大利基民黨政府歷經掙扎，終於不可避免的走上內閣總辭，國會解散，提前大選之途。將於六月二十、二十一兩日舉行的義大利大選，可能予勢力日漸膨脹的義共以可乘之機，已經漸成「氣候」的義共會不會經由民主選舉而獲得中央政權，這是舉世矚目，衆所關心之事。

基民黨的分崩離析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義大利所以陷入今日的糜爛之局，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就表面上看，基民黨的莫洛內閣之所以被迫提出總辭，乃導因於社會黨之撤銷對基民黨政府的支持。左傾的社會黨曾要求莫洛政府擬議緊急經濟計劃，以應付義大利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同時，社會黨要求基民黨給與義共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享有更大的發言權。社會黨的這些「窩裏反」建議並未為莫洛政府所接受，於是，它即採取杯葛立場，導致聯合內閣的垮台。

但深一層分析，今日義大利所面臨的主要危機有三方面：其一、為制度

義大利政局及其大選

在對外關係上，印度已決定和巴基斯坦談判復交。同時不結盟國家高層會議將於八月在可倫波召開，印度正好利用與毛共關係正常化，表示其外交政策並不受制於蘇俄，其傳統的不結盟政策，也就可以取信於亞非各國了。毛共自周恩來死亡後，內部奪權鬥爭正方興未艾，如能藉與印度關係正常化，多少可消除一旦毛俄交惡後，來自希瑪拉雅山的威脅，所以在毛共與孟加拉交換大使後，同意與印度恢復大使級的關係，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不過毛共與印度交換大使，並不表示雙方關係的全面和好，雙方過去十五年來的糾紛及其基本上的矛盾，斷非派遣「大使」就能解決，而且毛印關係的這一變化，與印俄關係也不會發生直接的關係，所以甘地夫人最近訪俄，其用意也就在此。

的缺陷。義大利憲法運用的結果，恰如法國第三共和一樣，總統徒擁虛名，議會裏政黨林立，內閣起伏不定，遇有危機，舉國惶惶，缺乏強而有力的領導。基民黨雖是執政的第一大黨，但它本身分別離析，勢力各不相上下，掣肘多於攜手。①舉例而言，黨內最強而有力的是保守的「多羅派」(Dorotei)，擁有百分之廿七的黨員，以城市為骨幹的「新力派」(Forze Nuove)則有黨員百分之十。大體而論，黨內分成兩股旗鼓相當的敵對力量，一為年老而較保守的一派，一為年輕比較進步的一派，兩者皆以僅占百分之八黨員的莫洛派(Morotei)為馬首是瞻②。

在義共眼中，基民黨無寧是一個貪污、腐化、無可救藥的集團，既缺乏有力的政治號召，亦無嚴明的紀律和組織；換言之，它不過是個只求選舉獲勝，出掌政權的「選舉組合」而已。經過三十年的統治後，基民黨已開始嚴重腐蝕，最近，其所受的詆毀與羞辱堪稱空前，而且來自社會每一個角落。城市青年對其制度的僵化加以無情的嘲罵，婦女們為墮胎合法化而大聲疾呼，中產階級對它的貪污、腐敗、無效能而深表不滿。義大利各報不斷以巨大篇幅剖析基民黨的危機，並努力發掘政府疲憊的新症候。③